

## 第四部分 艺术风格论

### 小 引

艺术发展的生命在于独创性，作家永恒的艺术生命就在于独具的风格。古今中外，在文坛上闪耀着光芒的，唯有那些独具风格的艺术家，且看嵇康之峻烈，阮籍之旷达，陶渊明之平淡，谢灵运之清新，李白之飘逸，杜甫之沉郁，乃至“郊寒岛瘦”、“神韵”、“性灵”，无不以其独具的风格，雄视千古，流韵万代。中国如此，西方亦然：但丁的深沉，莎士比亚的弘博，莫里哀的幽默，雪莱的奔放，巴尔扎克的深刻，契诃夫的简洁，乃至现代派的“意象”、“荒诞”，也无不以其独具的风格，留下那永恒的魅力，无穷的韵味。面对文艺上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，中西的文论家都对之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，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艺风格论，其中既有中西相通之共同规律，亦有中西相异的民族特色。

西方风格论提出较早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《修辞学》里便谈到了风格问题，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则写出了风格之专篇《论崇高》。中国古代文论（特别是上古时期）几乎没有与西方“风格”相对应的“风格”一词。这本来并不奇怪，中西文化自有其独具的理论术语。可是，许多人对这一点曾感到大惑不解，或者怀疑古人不行，提不出什么艺术风格论，因而对之嗤之以鼻，或者大为古人抱不平，硬去古书中搜寻“风格”一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果然还真给找出来了。祖譔在《刘勰的风格论简说》一文中指出：“用‘风格’一词来评文，当以刘勰为始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两次使用了这一词儿。《议对》篇说：‘汉世善驳，则应劭为首……亦各有美，风格存焉。’《夸饰》篇说：‘虽《诗》《书》雅言，风格训世，事必

宜广，文亦过焉。’……显然是指诗文的风范格局而言的。”舒直则明确指出：“刘勰在这里论应劭、傅咸、陆机等作家的作品，认为是‘亦各有美，风格存焉’。认为这些作家各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，所以说‘风格存焉’。刘勰这样来明确风格的意义是十分确当的。”（《关于刘勰的风格论》，见《文学遗产》392期）似乎这些同志不但发现了中国诗学中“风格”一词的源头，而且也发现了刘勰对风格意义的“十分确当”的见解。夷考其实，大谬不然！在《文心雕龙》中《议对》篇的“风格”，其义与《章表》篇的“风矩”同义，与今天的“风格”含义大不相同。至于《夸饰》篇的“风格”二字，“格”字属误书，据杨明照先生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》考定，“格”字应作“俗”，从上下文意来看，“风俗训世”，才讲得通。该同志主观动机虽好，但不思误书，而曲为之说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，仅此小小的一例，便可见出用别人的框框来硬套中国的理论，的确是方枘圆凿、龃龉难入的！

中国古代风格论，自有自己的独特术语和一整套理论体系，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术语是“气”与“体”。曹丕说：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。”“徐干时有齐气”，“孔融体气高妙”（《典论·论文》）。对这种因“气”而生的文艺风格，谢榛《四溟诗话》描述道：“自古诗人养气，各有主焉，蕴乎内，著乎外，其隐见异同，人莫之辨也。熟读初唐、盛唐诸家所作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，秀拔如孤峰峭壁，壮丽如层楼叠阁，古雅如瑶琴朱弦，老健如朔漠横雕，清逸如九皋鸣鹤，明净如乱山积雪，高远如长空片云，芳润如露蕙春兰，奇绝如鲸波蜃气，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气”，多指由作家主观气质性格之不同禀赋，而在作品中形成的独特的风格。这种“因内而符外”的个人风格，近似于西方所说的“主观风格”。至于另一个术语“体”，则近似于西方所说的“客观风格”。（这是就其大体倾向而言的，因为有时“气”也指客观风格，而“体”也可指主观风格）这种“体”，既指各种不同文类的风格，也指各个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家流派的独特风格。刘勰说：“章表奏议，则准的乎典雅；赋颂歌诗，则羽仪乎清丽；符檄书移，则楷式于明断；史论序注，则师范于核要；箴铭碑诔，则体制于宏深；连珠七辞，则从事于巧艳；此循体而成势，随变而立功者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）这里的“体”，就是各种文类的不同风格。至于钟嵘之《诗品》，则专谈文学流派之风格及其渊源。如说古诗“其体源出